

China's Decision-making and Preparations for Enemy Surprise Attack in Early 1960s

20世纪60年代初期 中国防敌突然袭击的决策与准备

□ 杨贵华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防敌突然袭击的重大决策,并指导进行了初步准备。随着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加剧,防敌突然袭击准备扩展到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时,加速原子弹、导弹的研制,使中国具备了核、导弹反击能力。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领导全国进行的准备意义重大:抓住了时代机遇;打破了帝国主义核威胁;产生了强大的战略威慑作用;引导全国人民树立了准备打核、导弹条件下现代战争和全民战争思想。

主题词: 新中国军事史 20世纪60年代 防敌突然袭击 决策与准备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3)06-0028-04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进行反侵略战争特别防敌突然袭击准备的重大决策。此后,随着中国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战争威胁的加剧,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发展成为六七十年代全国全面战备行动。

一、世界军事进入核、导弹时代,中国领导人适时作出防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决策

1945年7月16日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空军基地,地球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原子弹正式诞生。8月6日和9日,美国以2架B-29轰炸机各携带1枚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正式投入战争。原子弹的巨大杀伤破坏力,使发达的世界大国竞相投入巨资发展核武器。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进入核、导弹时代。至60年代初,美国各种当量核弹头达数千枚,发射器(含战略轰炸机)多达2000架;苏联弹头数千枚,发射器370多架。

来自帝国主义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伴随着核、导弹武器的不断发展频频指向中国。据美国部分解密档案披露: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3年初,刚刚接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原子弹运到日本冲绳。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施一江山岛战役时,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必要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3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上说,将考虑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对付中国大陆机场。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反应,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赞同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致使艾森豪威尔紧急召见杜勒斯,就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进行讨论。他顾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会引起国内及全世界的恐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最后没有下此决心。

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和武装下,企图“反攻大陆”。美国不仅为其装备了先进的飞机、舰艇,而且将导弹武器运往台湾。1957年开始,美国在台湾修

建可起降 B-52 战略轰炸机的大型机场; 同年, 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 这种导弹既可携带常规弹头, 又可携带核弹头。美国太平洋舰队装备了潜射导弹, 游弋在太平洋上协台威胁、封锁中国大陆。

中共中央领导人密切关注核、导弹武器发展动向。1959年10月, 中央军委成立战略研究小组, 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战争方式等进行研究, 于1960年1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研究”报告。1959年12月17日, 总参谋部召开会议, 部署防范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指出: 帝国主义在未来战争中, 必将首先使用原子、导弹等新式武器, 向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重要工矿、军事工业、交通枢纽、主要后方基地等战略目标, 实施集中的、连续的突击, 企图陷中国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为尔后实施进攻创造条件。因此, 对于敌人这种战略思想和手段, 必须加以充分的研究和防范。这次会议, 还对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防护工程建设提出了要求。^①

1960年10月, 中央军委强调: 在未来战争中, 敌人实行战略性的突然袭击, 特别是从空中来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在现代条件下是大大地增加了; 中国不仅对于敌人的原子弹、导弹、化学、细菌武器的突然袭击要有充分的准备, 同时也要考虑到敌人在纵深地区实行战略空降的可能性。1961年8月12日, 总参谋部下达《关于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的规定》, 要求全军认真研究敌突然袭击情况和防敌突然袭击的措施, 掌握敌情动态。9月12日, 总参谋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小组”成立; 随即各军区、军兵种“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小组”相继成立。自此, 中央军委开始组织全军乃至全国, 进行全面的防敌突然袭击的各项准备。

二、中国对防敌突然袭击的指导: 在加强各项防护准备同时, 加紧研制原子、导弹武器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 各军区、各军兵种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领导小组, 抓紧制定防敌突袭方案, 进行防护准备。一是加强防突然袭击演习。全军加强防敌陆上、海上、空中袭击三种样式的研究和演练。1961年, 各军区和军兵种组织进行了核、化条件下军事演习, 防空

袭、防空降演习, 防导弹等突袭兵器演习; 组织实施城市防空袭和紧急疏散演习。二是加强重点目标、主要作战方向和首脑机关指挥防护工程建设。1960年, 中央军委提出“北重于南, 岛重于岸, 抓两头(海岛和前沿第一线, 以及纵深的首脑机关、重工业城市、交通枢纽等) 准备中间, 防原子、导弹、化学重于一般”的设防及工程建设原则。^② 计划1963年前在28个省、市修建就地防护隐蔽部267个。这一工程, 是其后全国大规模挖洞工程的前奏。三是建立和加强各级人防组织。20世纪60年代初, 根据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要求, 各大军区、各省、地级军事机关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充实加强人防机构。1965年4月, 中央人防委员会成立, 各级相继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和办公室。同时, 充分认识到, 要想有效地应对核、导弹武器和远程空袭兵器袭击的威胁, 制止核战争, 必须自己具备强有力的核、导弹反击能力。毛泽东在1958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原子弹“就这么大一个东西, 没有那个东西, 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64年7月, 毛泽东又说,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 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准备好了, 敌人要来也好办”。^③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 50年代中期, 中国果断作出研制发展导弹和原子弹的决策。到50年代末期, 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核和导弹研制基地、试验基地、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研究队伍等, 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60年代初因中苏关系破裂外援中断, 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遭受严重困难的艰难时刻, 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 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提出“埋头苦干, 发愤图强, 自力更生, 奋勇前进”的发展方针, 确定“两弹为主, 导弹第一”发展重点, 集中力量, 保证国防科研的顺利进行。

在中国核、导弹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第5卷, 206页,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第5卷, 207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下卷, 243~244页,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时刻,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在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对此,周恩来尖锐指出“几个大国垄断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本来就已经停止了,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事实上他们已经不需要大气层核试验了。为什么?因为主要的资料它们已得到了。除此以外,其他的在三国条约中统统保留。也就是说,允许使用核武器,允许地下核试验,允许继续生产,允许大量储存,允许向外输送扩散,允许美国把制造核武器的资料给它的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国家都受条约束缚,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但仍要遭受核讹诈和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①中国一贯主张和赞成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为不能设想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②同时,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打破核威胁,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核反击”能力。至60年代中期,中国核、导弹研制捷报频传: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4月,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成功,5月14日飞机载核弹投掷试验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5月26日,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日,担负核反击任务的部队——第二炮兵宣告成立。这些都表明,中国具备了核、导弹反击能力,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核恫吓,慑止其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

三、战争威胁加剧,防备敌人核、导弹及远程空袭兵器突然袭击准备,成为六七十年代全国全面战备的重大标志性行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直接感受到战争威胁不断加剧:1961年美国在越南实施特种战争后,于1964年8月发动了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国土边缘;美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支持国民党军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海上、陆上窜犯袭扰活动。中共中央在以主要精力关注和应付东部和南部军事威胁的同时,来自北部的安全压力也在逐步增大。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

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③并坚持把防备敌人核、导弹等远程空袭兵器的突然袭击作为战争准备的重中之重。

随着安全形势的发展,防突袭准备的深入,把防护准备由军事上扩展到国家经济建设方方面面。早在1961年初及在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强调:根据对于未来战争中敌人对我实行战略性的突然袭击,特别是从空中来的包括原子、导弹、化学、细菌武器和战略空降等的突然袭击的估计,对于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对于战略和战役的后方基地(包括各种仓库和医院位置)的选定,对于国民经济中厂、矿建设的布局,交通线路的选定,以及坚持“山、散”原则的要求等,应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其中属于政府部门的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必要的建议。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是: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④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立即组成由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的专案组,对国家工业布局、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突然袭击问题,进行深入调研。8月9日,该专案组向中共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② 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07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58页。

中央提交了调研情况报告,认为情况和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遭受敌国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做出了进行大、小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根据毛泽东要吸取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教训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小三线建设,改变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增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潜力,支撑前方武器装备、弹药生产需要,保证国家经济命脉、工业基地不因敌方突然袭击遭受毁灭性破坏,保证国家基本的工业和经济运转。三线建设在云、贵、川铁路公路建设,能源基地、钢铁基地、化工基地、航空航天和兵器工业基地等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全国城镇、乡村,展开大规模的挖洞工程。毛泽东在1965年1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老百姓怎么防空?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最好挖些地道,这里丢了炸弹,还可以跑到那里,还可以打仗。北京等各大城市都可以这样搞,分多少年完成。不然,一个原子弹打来,我们只好统统跑掉。”^①全国城市人防工程规模宏大,与城市市政建设紧密结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包括此后各重要建筑、居民区建筑规定必须有人防工程和标准,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城市人防工程,按能打、能藏、能生活,甚至能生产的标准建设,各厂矿、企事业、机关、学校、街道、居民,无一例外地投入到这项宏大的战备工作之中,加上学习“三防”等军事知识,成立各级军事组织等,成为这一时期全民战备的重大行动和显著标志。

四、防敌突然袭击决策和准备的重大意义

第一,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时代机遇和关键,引领中国走向并成为以核技术、火箭技术为代表的军事大国。近代以来,由于没跟上工业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国被迫用大刀长矛应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用土枪土炮和购买的落后武器,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先进大炮、坦克、飞机、舰艇,导致中国在近代多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惨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核、导弹时代武器装备发展对国家安全

的重大影响,及时作出防备敌使用核、导弹武器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决策,全国军民齐心协力,赶拼国防高科技,不断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

第二,中国具备核、导弹反击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邓小平在1988年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②

第三,防敌突然袭击的准备与行动,产生了有效的战略威慑作用。中国全面的全民的以防敌突然袭击为主要内容的备战行动,使美、苏等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中国核、导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中国进行过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包括援越抗美重大行动期间。全国同仇敌忾的备战行动和充分的准备,有力地慑止了敌人对中国发动战争和袭击。

第四,引导全国军民树立了“准备打核、导弹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和全民战争的思想”^③。在防敌突然袭击准备中,对全民开展反侵略战争备战教育,进行“三防”知识学习和军事训练,实施人防工程建设特别是居民的挖洞工程等,可以说是一次全面的国防动员和战争准备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这些,对于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杨贵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肖显社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92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204页。